

國際主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

余敏玲

摘要

由於受到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的影響，過去研究中俄關係的著作，經常出現完全親俄或完全反俄的兩極化觀點。再者，這些著作大多將焦點放在政治外交方面，忽略了文化因素在中俄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試圖加入文化因素，用文化與政治外交互動的角度，來看中俄關係，或可避免這種黑白兩分的窠臼。

蘇聯的國際主義有兩個層面：一是理想層面，承襲馬克思第一國際的理想，提倡平等，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努力。另一層面則是實際策略的運用，利用國際主義的理想，尋求並鞏固蘇聯的利益。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日漸重視的是國際主義的策略層面，但是國際主義對外最具號召力的則仍是其理想層面。

事實上，從國際主義理想的實現（或利他部份）到純粹的策略運用（即接近民族主義或自利部份）都可以是國際主義由一端至另一端的光譜。無論是政策的實施或是個人的行為舉止，均有可能在此光譜的兩極之間游走。在此光譜的中間灰色地帶，常會出現緊張關係，甚至衝突。但是，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也有可以互相依存、滲透、轉化的關係。本文擬以莫斯科中山大學所發生的具體事例，從民間、官方、與國際關係三個層面，來分析探討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俄羅斯沙文主義之間的糾葛與衝突；並藉著上述文化因素的加入，呈現出中俄研究更為複雜的面貌。

國際主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

余敏玲*

- 一、前 言
- 二、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成立
- 三、國際主義在民間
- 四、黨務風波下的國際主義
- 五、國際衝突中的國際主義：中東路事件
- 六、結 論

一、前 言

歷來研究中俄關係的著作，大都把重心放在政治或外交課題上。由於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的不同，對中俄關係的歷史解釋常常出現兩極化觀點，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這種情形在詮釋蘇聯時期的中俄關係上，表現得尤其明顯：不是蘇俄陰謀論，就是擁護蘇聯論。本文試圖加入文化因素，以莫斯科中山大學為例，來分析文化因素如國際主義、民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等，如何影響學校的實際運作。用文化與政治外交互動的角度，來看中俄關係，或可避免上述黑白兩分的窠臼。

1925 年蘇聯當局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學（簡稱孫大或中大）固然有其政治目的，有其自身利益的考慮，但也不能否認其中含有國際主義的理想色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本文修改期間，承蒙沈松橋、羅久蓉、楊貞德、翟志成、陳永發諸位先生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文中所有錯誤或不當之處，均由作者負責。

彩。成立孫大的目的之一是為推動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但是學校執行黨務的人員，抱持濃厚的種族偏見與沙文主義，以傲慢的第一個革命成功者即是老大哥的沙文主義心態，對待中國學生，因而激起學生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造成中俄師生關係的惡化。這種官方、公開的沙文主義傲慢態度對國際主義推展的傷害遠比日常生活中平常百姓對中國學生的侮辱來得更嚴重。因為這意味著執行共產黨政策的人都不能身體力行，又如何苛求百姓奉行呢？不幸的是，這些違反國際主義精神的情緒互相激盪的結果，不但阻礙校務與黨務的推展，更在校內各種政治鬥爭中推波助瀾，間接成為孫大關門的原因之一。由本文的舉證將可以看出，文化因素能侵蝕政治外交政策，使其無法完全達到預期目的。這恐怕是蘇聯建校之初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蘇聯當局也透過文化動員，揭棄國際主義的理想，吸引各界有志之士，而達到維護蘇聯利益的政治目的。

基本上，國際主義理想的落實所產生的種種問題，恰好說明了國際主義具有的烏托邦性質。吊詭的是，正是這個烏托邦特質激發人們的幻想，成為世界革命奮鬥的動力。著名的俄國史學者史泰慈(Richard Stites)，在《革命的夢想》(*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書中清楚地指出，俄國革命與俄國歷史上的烏托邦傳統有一脈相承的地方。烏托邦主義在俄國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種激發幻想的策略(a device for exciting the fantasy)：瓦解舊秩序，創造新世界，鑄造一種新人類。」它是俄國革命感情的原動力。¹俄國革命成功後的最初十年，整個俄國都籠罩在烏托邦理想社會的氣氛之中。不管是尋常百姓、知識分子、政府部門都有許多關於如何建立未來新秩序的理想藍圖；他們共同追尋的是一個公正、平等、各取所需、各盡所能，沒有人會受到壓迫，沒有人會感到疏離的「美麗新世界」。這些烏托邦理想，不但表現在各種政治計劃、意識形態、科幻小說與未來學，也表現在對技術的預測、都市與電氣化的崇拜等。他們進行各種社會實驗，如集體勞動、公社生活；並嘗試建立新的無產階級道德規範與禮節。

¹ 詳見 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35.

史泰慈書中談到的都是俄國對內的烏托邦思想與活動計劃。本文探討的焦點則是史泰慈書中沒有提到的，對外關係上的烏托邦理想——國際主義。同樣地，具有烏托邦性質的國際主義，在蘇聯所倡導的世界革命中，也起了上述「激發幻想的策略」的作用。

這裡所謂的國際主義指的是蘇聯的國際主義，以列寧、史大林的思想為主。艾雪(Micheline Ishay)認為自由主義派思想家的國際主義不是一種靜態的觀念。它會因為思想家觀念的轉變與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而更易其內容。²蘇聯的國際主義亦是如此。其內涵是因時變易的。要對任何主義下定義都是件困難的事，然而為使讀者閱讀時有脈絡可循，本文談及的蘇聯國際主義，基本上有兩個重要觀念。一是為尋求無產階級的解放，必須不分民族地團結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俾能推翻資產階級。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為了世界革命，必須反對因為資本主義發達而成為帝國主義的國家。另一重要觀念是，各種族、民族一律平等，並且均應如兄弟般地互相幫助。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享有特權，必須去除各民族沙文主義的心態。

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不但泯除了國界的分野，而且產生了「無祖國」的無產階級。馬克思與恩格斯將十七世紀以降，逐漸形成的國際主義觀念，賦與階級意義，提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³為達到推翻資產階級的目的，乃於 1864 年成立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以團結全世界工人，尋求無產階級的解放。第二國際繼承第一國際的理想，建立於 1889 年，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成員紛紛護衛自己的國家，無形之中不解而散。⁴

² Micheline R. Ishay, *Internationalism and Its Betray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 xxi.

³ Ishay, pp. 19-76。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到共產黨人與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相同，「共產黨人特別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他們和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致：「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卷 4，頁 469-471，479。另參 Alan Gilbert, "Marx on Internationalism and War," in *Marx, Justice, and History*, Marshall Cohen et al. ed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85-208。

⁴ 第一國際後來內因與無政府主義的衝突，外因巴黎公社失敗、歐洲各國政府逮捕激進

列寧於 1919 年成立第三國際（又稱共產國際），主張各國的無產階級鬥爭應拋棄狹隘的民族本位觀念，以全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為最後依歸。⁵並且呼籲一切民族和殖民地解放運動必須與蘇維埃俄國建立密切的聯盟，共同打倒資產階級，否則別無生路。⁶列寧對國際主義詮釋的最大特色，就是將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與反對帝國主義結合在一起。由於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要打倒資產階級，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國家。唯有如此，無產階級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另一特色則是重視民族問題，並且將聯盟對象擴及被壓迫的民族。⁷一次大戰之前，列寧已體認到各國民族運動逐步走向形成民族國家的趨勢。他提出的少數民族自決策略，是間接促成奧匈帝國瓦解的原因之一。同時他又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提倡民族平等來吸引俄境內個少數民族支持革命。一次大戰之後，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建立世界新秩序，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因此，列寧更加重視民族平等的問題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殖民地問題，特別是受帝國主義之害最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的被壓迫民族。⁸

必須注意的是，列寧是行動家，不是純理論家，他認為理論必須為政治服務。列寧比馬克思佔優勢的地方在於第三國際成立時，他已取得政權，成為一國元首，能主控第三國際，不像馬克思那樣，必須與巴枯寧在第一國際內競爭地盤。再加上列寧重視組織，因此，第三國際比起第一、第二國際在組織上要嚴密得多，並且還有一個常設性的中央集權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國際的另一特色是，時時以革命為念的列寧將其轉化成宣傳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促進世界革命的機器。

世界革命固然是列寧政治計劃的一部分，如何鞏固蘇維埃政權則是他的

份子而瓦解。第一與第二國際的成立與解散，詳見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 1, pp. 244-257; vol. 2, pp. 1-30.

5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寧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卷 31，頁 128。

6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卷 31，頁 126。

7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卷 22，頁 179-297。

8 列寧，〈論民族自決〉，卷 20，頁 395-457。另參 Alfred Cobban,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System" in *Nationalism*, John Hutchinson & Anthony D. Smith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45-250.

終極關懷。第三國際成立之初，俄國內戰尚未結束，推展世界革命之餘，實質上兼含捍衛蘇維埃之心。因此，第三國際自創立伊始，即具有雙重任務。1927年，當蘇聯政權再度內外受威脅時，史大林遂將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直接與蘇聯的利益劃上等號。⁹從列寧到史大林，國際主義的內容因應俄國時局的變化，從鞏固蘇維埃政權，逐漸轉化為維護蘇聯在世界各地利益的意識形態。然而，這並不意味國際主義的理想色彩完全消失。史大林即使在倡導「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時，對世界革命只是採取比較審慎的態度，並不是完全不要。¹⁰

換句話說，對蘇聯而言，國際主義有兩個層面：一是理想層面，承襲馬克思第一國際的理想，提倡平等，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努力。自1906年以來，「國際歌」即為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黨歌，直到蘇聯解體，它一直是蘇聯共產黨黨歌。並且於1918至1944年曾為蘇聯的國歌。¹¹再者，十月革命之後數年，蘇聯官方鼓勵人們以「蘇聯」或「蘇聯人」代替「俄國」或「俄國人」。¹²其目的即是要去除俄羅斯沙文主義心態。這些均可證明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確實有些國際主義理想的存在。另一層面則是實際策略的運用，利用國際主義的理想，尋求並鞏固蘇聯的利益。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日漸重視的是國際主義的策略層面，但是國際主義對外最具號召力的則仍是其理想層面。這個具有烏托邦性質的理想層面正是激發各國有志之士投入無產階級界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⁹ 當時蘇聯內有激烈的史大林與托洛斯基派的政治鬥爭，外有與英國交戰的威脅；在此內外交攻的情況下，史大林宣稱，「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毫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因為蘇聯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基地，不捍衛蘇聯，就不能捍衛並推進世界革命運動」。（劃線部分，原文如此。）「若想撇開蘇聯，反對蘇聯而捍衛世界革命運動，誰就是反對革命，就是革命的敵人」。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卷10，頁47。

¹⁰ Lars T. Lih, et al. eds.,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8.

¹¹ 史大林於1944年另作國歌。見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大蘇聯百科全書]（莫斯科：蘇聯百科全書出版社，1972），卷10，頁322。

¹² Ronald Hingely, *Russian Writers and Soviet Society, 1917-1978* (London: Methuen & Co., 1979), pp. 37, 98.

一些俄國學者均理所當然地認為，蘇聯成立了若干訓練外國人的共產主義學校，散播馬列思想，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作準備，是履行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務，具體表現了馬克思列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理想。¹³然而他們的評價，只是呼應了蘇聯官方的宣傳，卻將歷史現象簡化了。

事實上，從國際主義理想的實現（或利他部份）到純粹的策略運用（即接近民族主義或自利部份）都可以是國際主義由一端至另一端的光譜。無論是政策的實施或是個人的行為舉止，均有可能在此光譜的兩極之間游走，並不是只能有光譜的一端存在而已。在此光譜的中間灰色地帶，常會出現緊張關係，甚至衝突。或許有人認為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等觀念的衝突，並非新鮮事，不足為奇。然而到目前為止，尚無著作用具體的例子論述二次大戰之前兩者在蘇聯衝突的實際情形。¹⁴本文擬以莫斯科中山大學所發生的具體事例，從民間、官方、與國際關係三個層面，來分析探討這些複雜的問題。換言之，本文的要旨在探討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俄羅斯沙文主義之間的糾葛與衝突，並無意對各種主義做純理論的探討。

二、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成立

1920 年代，共產國際先後成立了數所專門訓練蘇聯境內少數民族與各

¹³ Н. Н. Тимофеев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 (КУТВ) (1921-1925)" [共產主義東方勞動者大學，1921-1925]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亞非人民] 1976，第2期，頁57；"КУТВ"，1979，第5期，頁42；А. В. Панцов, *Из Истории Идеинной Борьбы в Китайско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 20-40-х Годов* [中國革命運動中意識形態鬥爭的歷史片段，1920-1940年代] (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5)，頁51；В. Н. Усов,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деле подготовки китайских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кадров в 20-30-е годы" [蘇聯對訓練中國黨務幹部的國際援助，1920-1930年代]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1987，第5期，頁85；Г. В. Ефимов, "Из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共產主義中國勞動者大學歷史片段]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遠東問題] 1977，第2期，頁175。

¹⁴ 目前談論蘇聯國際主義與其他國家關係的專著以二次大戰後的東歐為主。例如，Jonathan C. Valdez,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Ideology of Soviet Influence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國共產黨員的學校，宣傳馬列主義，以便其返國後從事革命工作，¹⁵莫斯科中山大學即是其中之一。¹⁶比較特殊的是，孫大是一所專為中國人創辦的學校。蘇聯當局認為，中國必須先經過類似俄國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才能有相當於俄國十月的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亦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衡諸當時中國情勢，只有國民黨有足夠勢力領導這個國民革命；而這個國民革命乃是整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名義上，孫大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在訓練國民黨員成為政工人員，以協助民族〔國民〕革命運動的推展。¹⁷實際上，是要培養一批職業革命家，期望他們回中國後製造另一個布爾什維克革命。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不久，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即決議在蘇聯為中國勞動者成立一所新的大學，或擴充原有的共產主義東方勞動者大學中文班。¹⁸經過多次討論，政治局決定建校地點在莫斯科。¹⁹同年10月7日，鮑羅廷(Mikhail Borodin, 1884-1951)方在廣州寓所召開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第66次會議，請國民黨派學生前往入學。²⁰1925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八週年當天，莫斯科中山大學舉行開學典禮。

關於孫大的財源問題，眾說紛紜。美國記者路滋(John M. Roots)相信，

-
- ¹⁵ 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來自荷屬印度的馬林 (Maring, 原名 Hendricus Sneevliet) 提議讓東方革命者有機會到俄國住段時間，學些共產主義課程，使他們能正確瞭解蘇維埃共和國，能徹底執行共產國際的提綱，並能在殖民地建立蘇維埃組織和進行共產主義工作。《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文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頁271-272。
- ¹⁶ 俄文是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им. Сун Ят-сена，縮寫是 УТК。又稱為孫逸仙大學。1928年改名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КУТК) 共產主義中國勞動者大學。
- ¹⁷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ЦХИДНИ) 俄羅斯現代史檔案保管與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2。
- ¹⁸ 1921年成立的共產主義東方勞動者大學，是一所為蘇聯境內東方少數民族與亞洲、非洲共產黨員設立的學校。ВКП(Б), Коми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1920-1925〔俄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文件，第一卷，1920-1925〕（莫斯科，1994），頁534。以下簡稱《俄共文件》。
- ¹⁹ 《俄共文件》，頁539，553，558。
- ²⁰ 國民黨黨史會，廣州政治會議記錄，001 / 29。

成立孫大的資金是由蘇聯與中國共同負擔，中國占主要部份。²¹游津(Xenia Eudin)與諾思(Robert North)則認為，孫大最初主要財源來自國民黨，蘇聯也負擔一部分。1927年夏天以後，才由蘇聯獨自負擔。²²另一說則謂孫大財源來自俄國退還的庚子賠款。²³但根據國民黨黨史會的現有檔案顯示，截至1927年1月3日為止，蘇聯仍與廣州政府討論如何利用庚款，雙方並未就是否補助國立八校〔未載明那八所國立大學〕的問題達成協議。²⁴

筆者認為孫大從創校開始，主要財源即來自蘇聯，國民黨方面即使有資助，恐怕也很有限。根據莫斯科的檔案，1925年9月1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原決議給孫大的預算是550,000盧布。²⁵1926年春，第一學年的預算已增為730,000盧布，全部由蘇聯財政人民委員會提供。²⁶衡諸國民黨當時的財力，不可能單獨負擔如此龐大的開支。當時廣州政府的財政已經相當困難，連黃埔軍校建校經費都要蘇聯資助，又如何有可能提供孫大經費？²⁷莫斯科的俄羅斯現代史檔案保管與研究中心有一份文件提到，蘇共宣傳煽動部曾建議共產國際，向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募捐，以便資助孫大。²⁸但並無更進一步資料顯示國民黨曾有捐款。

孫大雖以招收國民黨籍學生為主，然而，由於當時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

21 John McCook Roots, "The Moscow end of Chino-Soviet affairs," *Asia* (New York), 27:6 (June 1927), p. 472. 中國部份來自富有的親國民黨份子與華僑。

22 Xenia J. Eudin & Robert 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A Documentary Surve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2nd ed.), p. 86.

23 白瑜，〈有關留俄中山大學〉，《六十年來中國留俄學生之風霜淖厲》（台北：中華文化基金會，民77），頁45。

24 國民黨黨史會，漢口檔，5004，7963。自1924年以來，中蘇政府討論庚款用途，其中最主要的項目是在補助國立八所學校。見中研院近史所外交檔，03-08，函12。

25 《俄共文件》，第1卷，頁609。孫大創校後的第一、二年，教師月薪約為110盧布。俄檔案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1，卷宗號16，頁35。而根據《前進報》報導，當時莫斯科工廠最高到最低（經理到童工與生手）的工資分別為225和30盧布。《前進報》（莫斯科），1926年4月2日，期17，頁3。

26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1，卷宗號9；卷宗號10，頁18。

27 1924年蘇聯撥款兩百萬盧布給中國，黃埔軍校亦是其補助對象之一。1925年5月29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決議再撥款450,000盧布供黃埔軍校及成立兩個新師團之用。《俄共文件》，卷1，頁565，570-571。

28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1，卷宗號9。

政策，跨黨情形普遍，共產黨籍學生為數甚多。以第一學期 281 名學生為例，²⁹據俄國學者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估計，共產黨籍約佔 68 %。³⁰國民黨籍學生王覺源稱，90 %從廣東去的是國民黨員，而從上海、北京、天津去的才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³¹但是，王覺源沒有考慮廣東去的國民黨員的跨黨身分，所以估計的國民黨籍學生比率過高。

中國學生赴蘇求學固然會有個人私心——難得的免費出國進修機會或純為個人前途考慮，卻也不能否認同時可能兼有理想主義的動機——為學習共產主義，革命方法與組織，以尋求解救中國之道。³²中國知識份子對俄國革命及其意識形態發生興趣，是在蘇聯宣布廢除沙皇時期對華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之後。雖然這個宣言實際上沒有完全實現，但在當時對中國知識份子卻有莫大的鼓舞作用。許多人認為這個新成立的政權確實有別於其他西方強權。李大釗(1889-1927)便說過，支持蘇聯放棄在華特權，不是因為收回一點物質權利而感謝，而是因為蘇聯能「在這強權世界中，表顯他們的人道主義、世界主義精神，才去欽服他們的。」³³當時與李大釗有類似想法的知識份子不在少數。瞿秋白(1899-1935)擔任《晨報》記者時，亦撰文表示，中國知識分子因對凡爾賽和會失望轉而寄望於俄國。瞿氏認為俄國的工人運動，兼具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性質；是為了個人幸福，也是為了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幸福。中國人雖曾聽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卻沒有起來響應，原因在於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很少，沒有組織與知識，但是中國知識份子理解「必須幫助中國無產階級與國際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為人類服

29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10，頁 22。

30 Alexander Pantsov, "From Students to Dissidents: the Chinese Trotskyism in Soviet Russia," *Issues and Studies*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ch 1994), Part 1, p.18.

31 王覺源，《留俄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民 77，第十版），頁 10。當時陳獨秀主管華北學生的派送，他派去的 103 名，全是中共黨員或共青團員。《俄共文件》，卷 1，頁 654。

32 Miin-ling 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5, pp. 142-144.

33 李大釗，〈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下冊，頁 214。

務。」³⁴ 1923年春，瞿秋白將「國際歌」譯成中文，此後這首歌逐漸在青年學子中流傳開來，許多中國學生在赴蘇途中，大唱「國際歌」，即反映了他們的國際主義情懷。³⁵

每個中國學生對國際主義的認識與理解，可能與蘇聯國際主義的定義相同，也可能不同。例如，孫大共產黨籍學生王稼祥(1906-1974)寫信告訴在華友人，中國只有用革命推翻帝國主義才能獲得解放。「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國要打倒帝國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也是要打倒帝國主義；所以東方的被壓迫的民族，一定要和西方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去幹革命不可。」³⁶他的認知和蘇聯的定義大致相符。在國民黨黨員部份，有人投考孫大的理由是「蘇聯是革命先進國，有許多供我們參考的材料，做我們革命地理論和實際，並且〔使〕我們更具有世界革命的預備，以期世界歸於大同」。³⁷即使並非所有國民黨籍學生都會贊同世界革命的看法，他們對於蘇聯國際主義中的打倒帝國主義部份，仍能產生相當的共鳴；希望到蘇聯學習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方法與理論，以便完成國民革命，統一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剷除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此外，也有學生到俄國讀書除了好奇，也帶有幾分對蘇聯新社會的憧憬嚮往。「到俄國去看看！」乃是當時許多中國青年的共同願望。³⁸

雖然成立孫大有國際主義的目的，學校卻沒有專門教授國際主義的課程。這可能是因為學校當局認為，國際主義的內容與精神已包含在馬列主義中，無須另外開課。然而，俄共聲稱無意使孫大成為共產主義學校，其課程內容仍以馬列思想為核心。不過，最初孫大所有課程以介紹西方革命經驗為主，自1928年秋天以後，才有一些關於中國革命的課程。基本上，孫大課程內容包括俄文、社會形成進化史、中國革命運動史、俄國革命史、東方革

34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卷1，頁168。本文是瞿秋白在莫斯科《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公報》第一期發表的（1921年2月27日）。

35 《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81。

36 王稼祥1926年下半年或1927年初給王柳華、王久長的信，轉引自戴惠珍，《青年王稼祥》（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頁89。

37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23，頁2。

38 王覺源，《留俄回憶錄》，頁3-5。

命運動史、西方革命運動史、唯物論、經濟地理學、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39

孫大成立之際，蘇聯內戰甫告結束，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為脫離困境，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可是各種民生用品與食品，依然匱乏不足。當時一般蘇聯大學生每月餐費是三十盧布，而且實行麵包配給；孫大學生則是六十盧布，不但不受配給額的限制，而且供應質量很好的麵包、牛奶、奶油、肉等一般人不容易吃到的食品。他們除了學費、膳宿費全免，每個月還可以領到二十盧布的零用錢，其他共產主義學校的外國學生只有十盧布。孫大學生知道他們所受的待遇無比優渥，40對蘇聯自然是心存感激，家境貧窮，曾經失學的青年尤其如此。

然而，一般俄國人眼中的中國是貧窮落後的，中國人怎麼會有錢到莫斯科讀書，俄國人也會心生疑問。學生便常常碰到俄國人輕蔑地問他們，到莫斯科讀書的錢是哪裡來的？被激怒的學生總是答稱，廣東革命政府資助的。有時，學生受不了無禮粗魯的態度，便回說「不關你們的事，但錢絕不是從俄國人的口袋裡來的！」41另外，學生受無神論教育的影響，平常在學校附近看見老太太們進金頂教堂祈禱，便模倣其動作，也雙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詞，加以捉弄取笑。老太太們便憤而罵道，「你們這般吃我們白麵包的人，害得我們自己沒得吃，吃飽之後還要褻瀆我們的上帝嗎？」42由此可見，許多蘇聯人對於自己國家經濟拮据卻仍然幫助外國人，心存不滿。對他們而言，吃飽肚子要比空洞的國際主義口號重要得多。這可能也反映出一般老百姓對官方所謂國際主義的瞭解甚少。

也有孫大學生對蘇聯寧可犧牲自己人民的福利來幫助中國人，感到困惑不解，以此詢問該校老師時，一位老師說革命黨不能小氣。另一位老師則

39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30，頁 107；1927 秋天後，教務與課程的改變，見 Miin-ling 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p. 116-119, 301; 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1), pp. 61-64, 78-79.

40 Miin-ling 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p. 130-136.

41 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p. 33.

42 毛以亨，《俄蒙回憶錄》（出版年、地不詳），頁 172。

說，不論大國小國，都需要朋友，以對抗共同的敵人。⁴³這兩個回答聽起來有點像外交辭令，但其中也有一些道理。蘇聯既然視中國革命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份，幫助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邁向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歷史必經階段。為了更廣大的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蘇聯即使在艱困的經濟情況下，也願意犧牲自己的部分利益，資助孫大，這正是「兄弟般幫助其他正在與資產階級鬥爭的民族」的表現，亦是一種國際主義理想的實現。但是，對蘇聯而言，孫大的成立亦含有國際主義的策略層面，即偏向蘇聯民族主義的利己考慮——運用國際主義的理想，尋求更多支持共產主義的盟友，以便打破孤立的外交環境，鞏固蘇聯微弱的政權與國際地位。而對許多中國學生來說，他們懷著某些理想到孫大來讀書，不論是為了國民革命或世界革命，多少帶有國際主義理想色彩，卻都以救中國的民族主義目的為最後依歸。由此可見，對蘇聯或孫大學生而言，孫大的成立都同時含有國際主義的理想與民族主義雙重意義。

三、國際主義在民間

中俄接壤之長，為世界之最。但自近代有接觸以來，中俄兩國關係並非一直友好。住在邊界地區的中俄人民，又因涉及勞工與經濟利益等問題，關係更難稱融洽。⁴⁴由於傳統的文化沙文主義的影響，中國人向來視外國人為蠻夷，稱俄國人為「毛子」。另一方面，俄國文化傳統素來唯西方馬首是瞻，再加上曾受到蒙古人的統治，「黃禍」之說深植人心；近代一般俄國人眼中的中國是貧窮落後、愚昧無知的。

十九世紀以來，俄國版圖急遽擴張，許多少數民族成為俄羅斯帝國的子民。由於歷史、文化、宗教等因素，俄羅斯民族對這些少數民族有很深的偏

⁴³ 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p. 95.

⁴⁴ 在赤塔發行的《工人報》中，常常有關於中俄工人衝突的報導。當時被派到西伯利亞工作的孫大學生在寄給學校的工作報告中，常常提及遠東地區的種族歧視十分嚴重。例如，同樣的工作，俄人月薪 120 盧布，中國人與韓國人則只有 50 盧布。俄國工廠經理還發臭肉給東方工人吃等等。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2，卷宗號 89，頁 14；卷宗號 95，頁 35。

見，對少數民族的種種嘲弄幾乎是家常便飯。列寧深知俄羅斯民族的這種心態。⁴⁵他為爭取非俄羅斯民族支持共產革命，曾多次呼籲各民族應消除不同信仰與歷史因素的仇視，強調階級團結比種族利益更重要。他宣稱社會民主黨（即後來的蘇聯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是，「絕不容許對任何民族實行哪怕是極輕微的壓迫，絕不容許一個民族享有任何特權。……我們要求國內各民族絕對平等，並無條件地保護一切少數民族的權利。」⁴⁶這個民族平等的訴求確實吸引許多俄國少數民族參與革命，特別是猶太人。

十月革命成功之後，蘇聯當局一再強調「各民族一律平等」，這裡的各民族自然包括國外的民族；並將種族歧視宣傳為進口的資產階級邪惡。一般中國學生相信這樣的宣傳，而且有親身的經驗。例如，蔣經國會回憶他在俄國休養所與俄國人打成一片，對俄國人完全將中國學生當作自己人，十分感動。認為「他們這種天下主義的精神，不把人類分色分族而完全以平等的態度看待，實在使人敬佩，尤其是我們到處受人家欺侮的中國人更深感佩。」⁴⁷姑且不論這是否為蔣經國一廂情願的想法，是否符合當時一般俄國人對待中國人的實情，他的感受確實反映出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備受外人欺凌歧視，因此外國人一些友好表示或比較平等地對待，都很容易讓中國人感動不已。也因為有這樣的信念與經驗，孫大學生對於違反民族平等的言語或行為，會有所質疑或抗議。

在一次黨的小組討論會上，有中國學生提問：為什麼還有打死猶太人的狹隘民族主義事件發生？俄國指導員答說，這是沙皇時代的舊思想作祟，猶太人有專門技術，譬如擅於經商致富，且擅於排擠他人。⁴⁸這樣的回答不但諉過於沙俄的傳統，也反映出即使是蘇聯共產黨員，對猶太人仍持有傳統偏見，共產主義洗禮所起的作用不大。事實上，當時反猶情緒仍十分普遍。莫

45 他回憶年輕的時候，在伏爾加沿岸的俄羅斯民族無數次嘲弄少數民族而不自覺。列寧，〈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續）〉，卷36，頁631-632。

46 列寧，〈拉脫維亞邊區社會民主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綱領草案〉，卷19，頁100。關於革命前俄國民族政策的討論，見 William M. Mandel, *Soviet But Not Russian* (Edmont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 1985), pp. 37-58.

47 蔣經國，〈我在蘇聯的生活〉，《蔣經國先生全集》（台北：行政院新聞局，民80），冊1，頁13。

48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86，頁1。

斯科區黨部亦曾行文孫大，要求校黨部加強遏止教職員與黨員的反猶言論與行爲。⁴⁹而學生的質疑，也多少反映出他們已經察覺到蘇聯民族平等政策的名不符實了。

本身是猶太人的俄共領袖托洛斯基(Lev Trotskii 1879-1940)，深知俄國人的反猶傳統、種族偏見、大國沙文主義傾向。所以他在孫大開學典禮致詞時，特別強調「從現在起，任何一個俄國人，無論他是同志或公民，凡是聳肩或用輕蔑的口吻問候中國學生者，都沒有資格成爲俄國共產黨黨員或蘇聯公民。」⁵⁰托洛斯基的話道出國際主義的理想，同時也有政策宣導的作用，可惜當時在座的聽眾是孫大師生，不是一般俄國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即使聽到托洛斯基這一席話，他們對中國人持有的傳統偏見，也不可能因此在一夜之間完全消失。幾乎所有在蘇聯的中國人，不管是華僑或中國學生，在蘇聯都常會碰到俄國人問他們：「中國人，需要鹽嗎？」(Китайцы, соли надо?)剛開始，許多不明就裡的學生，還以為是俄國人好意關心他們的生活；後來知道這句話的故事緣由，才了解話中所含有的輕蔑和嘲弄之意。故事本身可能有不同版本，其大致內容則如下：曾有一個中國人客死俄鄉，基於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他的親友要將屍體送回中國埋葬。時值盛夏，親友們爲了防止屍體腐化，放了一大堆鹽在棺材裡。海參崴的俄國海關人員驗關時，發現這個用鹽醃起來的屍體，認爲是一大笑話。這個故事因此不脛而走，傳遍俄國。而「中國人，需要鹽嗎？」也成爲俄國人最常侮辱中國人的一句話。有些中國學生聽到這句話，會憤怒得與俄國人打起架來，甚至鬧到警察局或告到學校當局去。可是警察局或學校當局並未採取有效因應措施，不是偏袒，就是不了了之。⁵¹

類似這樣輕蔑的態度也常發生在其他公共場合。例如，孫大學生每週固定要到校外的公共澡堂沐浴。公共澡堂裡的服務人員常常用粗魯無禮的態度對待中國學生。有位澡堂工作人員甚至對中國學生咆哮道：「你們來俄國，

⁴⁹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15，頁 28。

⁵⁰ 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p. 32.

⁵¹ 王覺源，《留俄回憶錄》，頁 182。

只是來吃麵包！」「蔣介石殺你們殺得太少！」據說，造成雙方關係緊張的部份原因是，學生沒有像其他顧客那樣給小費。孫大當局認為這樣粗魯的行為會給中國學生錯誤的印象，以為蘇聯工人都是這樣對待中國人民與中國革命的。⁵²所以力促有關單位儘速調查事件肇因，採取措施，糾正錯誤。有關當局的答覆卻是：知情的相關學生均已回國，無從調查事情真相。僅建議在各個公共澡堂放置意見簿，以防止日後發生類似事件。⁵³

學生沒有給小費不能算錯。因為自從十月革命成功之後，蘇聯當局亟欲樹立社會主義社交禮節的新規範，其中之一就是大力提倡在餐廳、澡堂等公共場合不給小費，認為給小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壞習慣。事實上，沒有給小費只是一個誘因，俄國服務人員真正不滿的，恐怕是不甘心為這批來自落後國家的有色人種服務，而又沒有額外的收入。此外，孫大雖然很重視這件事情，然而有關當局的答覆，卻有敷衍了事的味道。積習已久的舊有觀念，旦夕難改，固是人之常情，卻也反映出實行國際主義會遭遇到的阻力。

必須一提的是，上述談及的僅是俄國人的種族偏見與沙文主義，這並不是說中國人沒有這些問題，只是在當時的環境之下，凸顯不出中國人的種族偏見與沙文主義。西方勢力未進入中國之前，中國人有的是以漢人為中心的種族偏見，外國人當然也不放在眼裡；十九世紀之後，體會到西方的船堅砲利，物質發達，中國人對白種的西方人又敬畏又羨慕，對黑人則歧視依舊。另一方面，相對於二十世紀初俄國的強勢文化（指中俄相對的生活水準與物質條件而言），中國的文化沙文主義在蘇聯也因此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在公開場合表現出來。

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和俄國的沙文主義相比，並不遜色。1928年4月，孫大組織全校學生到列寧格勒旅行。學生們參觀了工廠、船塢、冬宮、夏宮等，以及與十月革命有關的歷史名勝。在冬宮博物館，孫大學生看到許多中國珍品，有位學生便問導遊，這些東西是怎麼跑到俄國來的？導遊完全沒有預料到會出現這樣的問題，突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最後，導遊答稱這些東西是透過各種私人或官方管道收購而來。這個回答卻令學生憤怒不已。

⁵²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34，頁 38。

⁵³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35，頁 16。

⁵⁴當時學生對沙俄時期兼併中國大片領土依然記憶猶新，⁵⁵面對陳列在冬宮博物館的許多中國藝術品，極可能是俄國人趁中國戰亂掠奪而來，學生的民族主義情緒頓時爆發。為避免尷尬與類似情形的重演，後來毛澤東第一次訪蘇，參觀冬宮時，蘇聯官方乾脆以「正在整修」為由，關閉中國廳。⁵⁶

理論上，如果中國學生真的相信且接受蘇聯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他們應該會同意中國珍品，一如中東鐵路（詳後），可以暫由蘇聯保管，直到中國有自己的無產階級政府後再歸還。實際上，學生的反應說明了瞭解或同意國際主義的抽象理論是一回事，見到實物後爆發的民族情緒又是另一回事。

由蘇聯官方對民間衝突事件的處理不力，可以看出蘇聯當局並不重視國際主義在日常生活層面的運作。發生在日常生活的衝突磨擦固是小事，但是日久也會影響中國學生對俄國的觀感。學生會對鹽的故事或澡堂事件不滿，甚至打架，也是因為背後有個思想的預設：蘇聯這個新國家是個講求平等，不應該有歧視的地方。當生活中所碰到的情景與自己的預設不合，他們會有不平之鳴。而這不平之鳴正說明了國際主義的理想沒有實現的事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有可能是學生不願接受任何「不平等」暗示的日常生活現實，轉而回到理想層面去追尋，才会有這些不平之鳴。而中國學生在博物館引發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反映出他們如何游走於國際主義理想與策略的光譜兩極之間。

四、黨務風波下的國際主義

日常生活中理論與實際不能配合，尚可原諒，畢竟對平常百姓而言，舊觀念不是一朝一夕即能改變的。但是執行共產國際政策的人，在公開場合發

⁵⁴ 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pp. 83-84.

⁵⁵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2，卷宗號 62，頁 252。

⁵⁶ 毛澤東對師哲說：「其實是不便對我們開放，不好意思讓我們看，因為沙俄盜竊中國的東西太多了。」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 443。

表違反國際主義精神的言論，其後果要嚴重得多。不幸的是，許多蘇聯共產黨員在處理黨務方面常有類似言論。他們的言語和行為含有的俄國沙文主義心態，激起中國學生強烈的不滿情緒，無論就理想或策略層次而言，都是對國際主義一大傷害。

孫大學生的政治生活異常複雜。因為國共兩黨的學生都有，所以學校創立之初，國民黨和共產黨在莫斯科均設有支部。由於校方在國民黨支部設有共產黨小組，並藉此吸收國民黨「中派」與「左派」份子，國民黨支部的活動力遠遠不如中共旅莫支部。1927年由於蔣介石的清黨，國民黨籍學生陸續回國，國民黨旅莫支部因而自然消失。而中共旅莫支部因為可以受到蘇聯共產黨直接的指導，甚至偏袒，自然要比國民黨旅莫支部活躍得多。但這也引發出不少政治問題。

中共旅莫支部於1923年春天，經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同意，在共產主義東方勞動者大學成立。第一任書記是羅亦農。⁵⁷中共旅莫支部原本直接歸中共中央委員會管轄，但是直到1924年秋天才向東方大學黨支部登記，而校方則從一開始便知道它的存在和活動。

最初，孫大的中共旅莫支部是由東方大學旅莫支部調出去的部份成員主持，主要負責人是任卓宣。任卓宣隨後不久即轉學孫大。他將黨務工作重點放在組織與訓練，並將東方大學原已嚴格的訓練計劃執行得更為嚴苛。除了不斷開會之外，還要求黨員日常生活紀律一如軍隊，並且實行嚴厲的自我批評，鼓勵黨員之間互打小報告，弄得人心惶惶，幾乎無人可以專心讀書。⁵⁸此外，任卓宣極力反對同學花時間學習理論或俄文，他認為到俄國最重要的是研究革命的方法，以便盡快回中國參加革命。⁵⁹學生受不了任卓宣的獨裁作風，紛紛向校長拉狄克(Karl Radek, 1885-1939)告狀。拉狄克因此在黨員大

57 蔡慶新，〈中共旅莫支部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動略述〉，《黨的文獻》1991，卷5，頁80。

58 訓練計劃詳見，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蘇聯陰謀文證彙編，民國十七年》（台北：文海出版社，民77），卷3，頁25-27。王覺源，〈留俄回憶錄〉，頁160-163；孫治方，〈關於中共旅莫支部〉，《中共黨史資料》（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2），卷1，頁180。

59 任卓宣，〈留俄及歸國後的回憶〉，《六十年來中國留俄學生之風霜淖厲》，頁74-76。

會上告誡學生要用功學習理論，中國革命才有希望，不要將時間全用來打小報告。他並且為中共旅莫支部擬了一個比較合理的工作計劃。⁶⁰但是旅莫支部的主要幹部依然採取獨裁般地訓練方式，結果引起同學強烈反彈。孫大學生為此舉行一連串會議譴責支部政策，校方也終於在 1926 年夏天解散中共旅莫支部。⁶¹

在孫大後來一連串的政治鬥爭中，校黨部書記庫丘莫夫(V. Kuchumov)曾指控中共旅莫支部的成立，含有狹隘的民族觀念。⁶²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中共旅莫支部內部問題固然很多，但它的成立與民族主義毫無關係。事實上，旅莫支部的存在根本是一種權宜之計。按照共產國際章程的規定，不住在設籍國的共產黨員，應加入其客居國的共產黨組織與勞工運動，外籍共產黨員是不准在客居國成立支部的。⁶³然而，當時主要由於語言的障礙，極少中國學生俄文已好到可以參與俄國人的黨團活動的程度。同時，孫大校黨部通曉中文的俄共黨員，更是屈指可數。⁶⁴所以，學校當局與共產國際默認中共旅莫支部的存在，而且最初並沒有干涉旅莫支部的事務。如果庫丘莫夫的指控成立的話，那麼蘇共當局為何允許莫斯科的數所蘇聯軍校的中國學生，同樣成立中共支部呢？據後來擔任毛澤東俄文翻譯的師哲(1905 -)回憶，當時他在莫斯科軍事工程兵學校學習，從 1927 年秋天以後，許多中共黨員，便不再以國民黨名義，而正式以中國共產黨員身分進行活動，過著中共與蘇共的雙重組織生活。⁶⁵蘇共當局並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由於孫大中共旅莫支部的解散，凡是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團員均須把黨團籍轉到蘇聯共產黨和共青團。其意義在使每一國共產黨員無論人在何處，都能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員。按照共產國際章程第十七條規定，「共產國際的每一成員，從一國遷移到另一國時，應受到共產國際當地成員的兄弟般的幫

60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2，卷宗號 33，頁 28-32。

61 Miin-ling 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p. 177-181.

62 孫大的政治鬥爭，詳 Miin-ling 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p. 191-248。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2，卷宗號 49，頁 316。

63 孫治方，〈關於中共旅莫支部〉，卷 1，頁 182。

64 孫治方，〈關於中共旅莫支部〉，卷 1，頁 180-181; 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p. 107。

65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 35。

助。」⁶⁶理論上，轉黨程序是自動且平等的，事實不然。中國學生轉黨除了必須填申請書，由兩名具有五年以上黨齡的蘇共黨員當保證人，經學校黨支部通過，再提到中大支部非蘇共黨員大會表決之外，還會被降一級，即中共正式黨員只能成爲蘇共候補黨員。但是，一位蘇聯共產黨正式黨員的東方大學學生轉入中國共產黨時，並沒有降級成爲候補黨員。⁶⁷必須注意的是，蘇共正式黨員與候補黨員的權利有絕大的分野：正式黨員可出席黨的所有會議並投票，並在黨委員會工作；但候補黨員只能在黨小組會議投票。⁶⁸正式黨員可自由出入共產國際大樓和蘇共中央總部，但候補黨員須填表方能進入。

69

許多中國學生對降級轉黨一事十分憤怒，頻頻質問校方，爲何中共黨員只能成爲蘇共候補黨員？有一次，托洛斯基派的劉胤（李麥麥）在學校大會上，提出應按黨章轉黨的問題。他說，按照章程規定，任何外國共產黨黨員都必須盡快轉入客居地的共產黨，以免因爲沒有參與黨的組織生活，而喪失黨籍。通常只要有證據能證明是某國共產黨員，就可立刻無條件轉黨，正式的轉入正式，候補的轉入候補，國際列寧學校海參崴黨部就是這樣辦的。然而，孫大的轉黨手續卻是過度複雜，且歧視中國學生。不料，校方卻因此指責劉胤故意在會場搗亂，劉胤憤而離席。⁷⁰嚴明傑（嚴靈峰）也曾爲轉黨問題投書學校的牆報，希望學校公開答覆。學校牆報委員會拒絕刊登，所持的理由是蘇聯是革命勝利的國家，而中國共產黨是仍在革命鬥爭之中，所以成爲正式蘇共黨員之前，必須有候補期。⁷¹

學生不斷的抱怨與不滿，終於迫使學校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1927年9月，新上任的校長米夫(Pavel Mif, 1901-1938)⁷²，向蘇共中央反映孫大學生轉黨所遭遇的問題。他說當時孫大創校只有兩年，根本找不到有五年聯共黨

66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文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頁763。

67 蔡慶新，〈中共旅莫支部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動略述〉，頁80。

68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16，頁12。

69 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p. 116。

70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118。

71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118。

72 拉狄克係托派份子，因捲入與史大林的政治鬥爭失敗，而於1927年初夏被解職。

齡的學生可以介紹他人入黨。又按聯共章程，候補黨員升為正式黨員需要五年的黨齡，以致學生就是一進入孫大便成為候補黨員，到他兩年畢業後也不可能成為正式黨員，何況學生申請由候補黨員變成正式黨員的申請書，在孫大隸屬的哈莫夫尼基區黨部積壓甚久，已逾半載，仍毫無下文。部份學生已經結束學校所提供的全部課程，打算留在蘇聯繼續求學、教書、擔任翻譯或其他工作，如果在校時不能及時轉黨，離校後轉黨則更為費時費事。米夫建議成立五人組成的常設性委員會，委員均有五年黨齡，以便審核申請，並為合格黨員開具介紹信。他也籲請考慮非共產黨員的個別狀況，將候補期由兩年縮短為一年。⁷³

米夫的建議沒有受到重視。除了一些與共產國際人員或俄國教職員關係較好的學生（當時只有俄國黨員才會有五年的蘇共黨齡，也才有資格介紹他人入黨）之外，其他學生的轉黨作業仍十分緩慢。後來，孫大 37 位學生聯名寫信給聯共中央，在指陳學校的種種弊端的同時，特別提到轉黨手續不但緩慢，而且變動頻繁。他們曾數度向支部反映，校方卻答稱俄共（布）黨在共產國際佔有特殊地位，因此對於他國，特別是中國轉來的黨員要特別審核。學生們認為校方的答覆明顯地違反了共產國際成員應兄弟般互助的原則。⁷⁴事實上，校方的回答所反映出的沙文主義心態，是個典型的例子。許多蘇聯共產黨員認為，由於蘇聯是第一個革命成功的國家，他們理應比其他正在從事革命的國家享有較多的特權。這封 37 名學生的聯名信似乎也沒有得到回音。此後轉黨速度並沒有提高，許多學生直到回中國時，仍在等候名單上。⁷⁵即使幸運轉黨成功，取得黨證仍然費時數月，甚至一年之久。⁷⁶

轉成聯共黨員之後也有問題。孫大校黨部被分為中國支部與俄國支部，兩個支部的書記都是俄國人。⁷⁷按照章程，中國人與俄國人並沒有什麼差別

⁷³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2，卷宗號 40，頁 29。

⁷⁴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5，頁 45。此信沒有日期；從上下文推測，可能寫於 1928 年。據稱，自 1927 年 9 月起，轉黨手續變了 3 次。在此期間，轉黨成功者只有 10 位（申請人數不詳），另有數位不成。

⁷⁵ Yuc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pp. 116-117.

⁷⁶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495，目錄號 154，卷宗號 434，頁 157。

⁷⁷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2，卷宗號 103，頁 3。

待遇，事實卻不然。俄國支部按理亦受校黨部管轄，卻自行其是。他們說，俄國人的經濟狀況比中國人好得多，所以需要另外的組織。在學校黨務中，他們經常運用人數的優勢，取得多數決，而與校黨部作對。⁷⁸孫大的行政組組長兼中國專家阿勃拉姆松(M. M. Abramson)更猖狂地說，「俄國人與中國人之間是不可能平等的！」⁷⁹這樣的評論顯示出強烈的種族偏見與沙文主義心態。阿勃拉姆松雖不掌管黨務，但經管學校行政事務，與他有同樣心態的俄國人並不在少數。而此心態反映在日常的黨務、校務運作上，更容易造成學生與校方的關係緊張。

1929年，蘇聯舉行例行性的清黨，清除黨內「不良與投機份子」，以提高學生的政治意識，執行黨的路線。⁸⁰全校師生都要參加，在清黨大會進行質詢和揭發。但是校黨部護短，俄國人之中只有兩位係托派份子，被開除黨籍，⁸¹其餘全部過關。連平常被學生指責貪污最厲害的總務組組長韋索塔(Evgenii Vysota)⁸²和最官僚的阿勃拉姆松也輕鬆過關，連一個警告也沒有。⁸³不過，孫大清黨委員會顯然知道校黨部有沙文主義的作風。所以，在孫大清黨總結報告中，提到校黨部存有「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作風。⁸⁴但是委員會並沒有明確指出校黨部的「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作風為何，應當如何改善。

清黨的結果使得有關當局意識到，幾乎全校師生全都捲入校內外一連串的政治鬥爭。最嚴重的莫過於許多學生均與托洛斯基派有聯繫，孫大成了中國托派在蘇聯的大本營。⁸⁵此外，實行國際主義理想所出現的落差，造成學

78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5，頁 222。

79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30，頁 38。

80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2，卷宗號 72，頁 120。

81 自從史大林取得對托洛斯基政治鬥爭的勝利後，在全國清黨活動中，只要被認定是托派份子，必定開除黨籍。

82 例如，學生指出他去中國買中文印刷設備時，花了兩萬盧布。事實上，一萬盧布即可買到品質很好的設備。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5，頁 175。另外，有學生指出韋索塔已被黨大會決議解職，然而已過了四個多月，決議仍未執行。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10，頁 59。

83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30，頁 29-34，104-116。

84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30，頁 398。

85 Alexander Pantsov, "From Students to Dissidents: the Chinese Trotskyism in Soviet Russia,"

生與黨部之間的衝突不斷，對於已經異常紛亂的黨務，無疑是雪上加霜。⁸⁶ 1930年夏天，共產國際決定關門孫大，其中原因固然很多，學生與校黨部不合所造成的衝突，甚至對立，亦是重要因素之一。

從中國學生轉黨須有候補期，轉黨申請必須有特別審核，學校俄國支部權力須大於中國支部，均可以看出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俄國沙文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它們之間衝突的結果是權力的介入，亦即蘇聯以第一個革命成功的國家，蘇聯國力強於中國等理由，要求中國小老弟服從蘇聯的決定。在此情況之下，出現蘇聯老大哥的心態也就不足為奇了。理論上，最應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員，在實際作為方面經常比一般無知的老百姓有更強烈的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心態，這對國際主義無疑是一大諷刺。

五、國際衝突中的國際主義：中東路事件

1924年，中蘇建交，簽訂《中俄條約懸案大綱協定》，決定由兩國共管中東鐵路。1927年，張作霖(1875-1928)政府在蘇聯駐北京大使館查獲許多宣傳共產主義文件，加上蔣介石的清黨，中蘇關係陷於谷底。1929年5月，東北軍又在哈爾濱的蘇聯領事館查獲大批有關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文件。張學良認為當時中東路的主要俄籍職員亦參與相關活動。7月，張與蔣介石等商量之後，決定強制接管中東鐵路。⁸⁷其後中蘇雙方紛紛撤回駐對方

Issues and Studies, Part 3, pp. 84-104.

- 86 學校關門的原因除了黨務之外，尚有學生抱怨教學品質低落，中共中央不滿許多孫大學生回國後投奔國民黨等。學生與中共進而要求蘇聯當局檢討該校功能，甚至存廢的問題。清黨結果與孫大關閉的原因，詳見 Miin-ling 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p. 249-273, 306-308.
- 87 當時國民政府可能基於下列幾個理由，決定採取斷然措施：1.其時史大林忙於黨內鬥爭問題，對外亦處於孤立，過去搜查蘇聯大使館無事，這次搜查哈爾濱領事館，蘇聯尚無強烈反應。2.日本不願見蘇聯勢力在東北擴張，猜測日本不會為此與中國為難。3.蘇聯向來標榜援助被壓迫民族，如因中東路對中國用兵，無以自圓其說。4.為討伐桂系勝利，收回鐵路，有助於提高國民政府聲望。但是國民政府估計錯誤，各國多不同意中國的行動，日本亦拒絕參加美國提議的由中立國仲裁中東路問題。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9），頁625。國民黨可能還有一個動機，那就是挑起張學良和蘇聯的鬥爭，對國民政府有利無害。

之外交人員，蘇聯並積極備戰，企圖以武力解決中東路問題。8月1日，蘇聯在伯力成立由加倫(原名布留赫爾，V. K. Bliukher, 1890-1938)將軍領導的遠東特別軍。史大林認為蘇聯對中東鐵路採取強硬的軍事措施，是爲了暴露中國政府依賴反動的國際帝國主義國家〔日本〕。⁸⁸中蘇開始交戰之後，中國軍力迅速落於下風。11月下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透過德國向蘇聯提出妥協條件。1929年12月22日，中蘇簽下和約，兩國隨即恢復共管中東鐵路。⁸⁹

早在1929年7月，蘇聯即已透過共產國際開始抽調一批中國學生到遠東工作。孫大對這件事，真是出錢出力。學校決議由教職員與學生各捐出月薪或生活費的百分之十，以供遠東特別軍的文化需要(культ-нужды, 未寫明內容是什麼)使用，同時也提議在遠東特別軍之下，由孫大組織一個大隊參戰。⁹⁰

當時尚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就讀的劉伯承(1892-1986)，被派到遠東紅軍司令部作參謀工作，師哲(已從莫斯科步兵學校畢業)則到內務部(即格別烏)負責審問被捕的華僑。⁹¹孫大學生組成的參戰隊，命名爲加倫營，由葉劍英(1897-1986)擔任營長，負責軍事訓練。⁹²根據孫大學生唐有章的回憶，開赴前線與張學良部隊作戰的國際旅，以中國人爲主體。周保中(1902-1964)爲該旅的大隊長，下轄兩個支隊。唐有章是海拉爾支隊支隊長。這兩個支隊配合蘇聯遠東紅軍在滿洲里激戰。參加戰役的學生後來也參與「教育」中國戰俘的工作。⁹³

由於在理念層次上，中東路引發的戰爭是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戰。因此遠東特別軍之中，蘇聯刻意組織一個國際旅，以便向世界宣揚這場戰爭不

88 "Letter 44," 29 Aug. 1929, Lars T. Lih, et al. eds.,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p. 174.

89 鄭長椿等編，《中東鐵路歷史編年，1895-1952》(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頁228-247。

90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1，卷宗號50，頁207。

91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47，49。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逮捕了200餘名蘇聯人，蘇聯也相應地扣留一些華僑作人質。

92 軍事科學院編寫組，《葉劍英傳略》(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頁54。中國學生實際加入戰場的人數不詳。

93 唐有章，《革命與流放》(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37-39。

但是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而戰，並且是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支持。中共中央於 7 月 17 日發出通告，呼應史大林的「保衛蘇聯即捍衛國際主義」之說，將此次戰爭解釋為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戰。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國民黨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國民黨收回中東路，便是進攻蘇聯戰爭的開始。為保護世界革命利益，必須擁護蘇聯。⁹⁴

9 月 10 日，署名志剛的孫大學生，寫了一篇〈中東鐵路事變的解剖〉，刊載在孫大發行的中文刊物《共產雜誌》。文中的第一句話便是「中東路事變是國際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嘗試！」作者強調修築中東路不是用俄國沙皇的錢，大部分用的是「俄國勞苦群眾的錢與中俄兩國工人血汗而築成的。因此，特別是站在中俄兩國勞苦群眾的階級利益的立場上，蘇聯不能而且不應該把中東路無條件地交還 1924 年的北京政府或現在的南京政府。因為，這些政府是剝削勞苦群眾的政府，是帝國主義的傀儡。……只有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後，蘇聯才能夠把中東路無條件的交還中國。」⁹⁵（劃線部分，原文如此。）

擁護蘇聯，支持國際主義的動聽口號，人人會說，臨到抉擇時刻，個人的動機便不一定是那麼崇高或冠冕堂皇。總會有一些人以個人的考慮為主，上前線只是為擺脫個人眼前的困境而已。例如，當時孫大有 27 名自共產主義東方勞動者大學軍事班轉來的學生，寫申請書要求參加遠東特別軍；其中有數位明言動機是由於感到在校學習吃力，因而申請回國，或退而求其次，志願加入遠東特別軍。⁹⁶

另一方面，卻也不能否認確實有學生因為支持國際主義而附和蘇聯對中東路事件的看法。在伯力，遠東特別軍政治署出版了中文報紙《擁護蘇聯》，以供被俘的中國士兵閱讀。⁹⁷此外，孫大派出的學生亦與擄獲的東北

⁹⁴ 中央檔案館，〈中央通告第四十一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1929 年 7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檔案出版社，1990），冊 5，頁 382-384。

⁹⁵ 志剛，〈中東路事變的解剖〉，《共產雜誌》（莫斯科：莫斯科中山大學，1929），期 1，頁 80，90。

⁹⁶ 俄檔案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59，頁 42。

⁹⁷ 丘古耶夫斯基撰，余敏玲譯，〈蘇聯境內出版的中文期刊，1918-1937〉，《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17，頁 157。

軍戰俘滔滔不絕地辯論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孰優孰劣的問題，⁹⁸他們認為參戰，並不是中國人打中國人，而是為維護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利益，必須打敗充當帝國主義走狗的國民黨及其幫兇的東北軍。所以他們能克服民族主義〔維護中國本身的利益〕的情緒而參戰，並且試圖說服戰俘接受他們的想法。吊詭的是，這些人也有可能是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兼有的學生，亦即同意為推翻帝國主義，為世界革命而戰，卻另有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愫——一種為尋求中國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主義。當時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就是為了救中國，就是因為這種與國際主義可以相容的民族主義，而接受蘇聯鼓吹的國際主義。

最耐人尋味的是，有些中國人囿於當時情勢，特別是身在蘇聯，難以違抗共產國際的指示，不得不上戰場打仗，私下卻認為中東路事件是蘇聯進攻中國。這種蘇聯當局所謂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是與國際主義有衝突的。參戰學生中有這種矛盾情緒的，可以唐有章為例。唐氏身為遠東軍海拉爾支隊長之一，帶頭截斷東北軍梁忠甲(1888-1930)部隊的後路。但是戰後回到莫斯科不久，他便被蘇聯當局扣上「天然托派」的帽子，而加以逮捕和流放。他被控的三項具體罪名之中，有一項來自學生檢舉，這名學生指控他在談話中說過，中東路事件不是張學良打蘇聯，而是蘇聯進攻中國。⁹⁹姑且不論這項指控是否屬實，根據常理推測，學生之中有這樣的情緒是很有可能。但是這項指控可以成立，而且可以使人下獄流放的話，意味著當時有學生認為國際主義與純粹民族主義的情緒相衝突時，應該捨棄民族主義。另一值得深究的問題是，參與戰役的劉伯承、葉劍英、伍修權(1908-)、師哲等人的回憶錄與傳記，或提及參戰，但對於他們在中東路事件的立場都隻字不提。為什麼？¹⁰⁰是因為當時他們確實相信國際主義，認為這場戰爭是為世界革命而

98 王爾瞻，《留俄印象記》（出版年、地不詳），頁 22。王爾瞻是當時在滿州里戰敗被俘的東北軍第 38 團團長。

99 另外兩項罪名是：1. 不信任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因為唐說過中國革命一定要由中國的列寧來領導，住在莫斯科洋樓的「革命家」不能領導。2. 唐試圖將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情緒帶入蘇聯共產黨。因為他對共產國際關於廣州起義的決議不理解。唐有章，《革命與流放》，頁 39-40。

100 《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劉伯承回憶錄》，第一、二、三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1985，1987）；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

戰，而在 1949 年以後的政治氣候與居高不下的民族主義情況下，難以明言 1929 年時的國際主義情緒？抑或有其他原因，著實引人深思。

中東路事件反映出中俄雙方十分複雜的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糾結。從俄國的角度來看，為中東鐵路出兵，是為保護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利益，這是民族主義的一面。另一方面，由於史大林對國際主義的再詮釋，維護蘇聯的利益即是維護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所以也是國際主義精神的表現。而從中國學生的角度來推敲，情形更為複雜。這其中有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容的部份，也有相斥的部份。有學生認為這場戰爭是為國際主義而戰，為中俄兩國的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戰，同時也是為求中國獨立於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主義而戰，這是相容的部份。但是也有學生，身在戰場，卻覺得為中東鐵路出兵是蘇聯進攻中國。這種想法被認為是「狹隘」民族主義的表現，無意中流露，卻可以成爲一種罪名，甚至導致被流放的命運。這恐怕是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衝突時所能受到的最嚴厲處罰了。

六、結 論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成立，不論從蘇聯當局或學生的角度，都含有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成份，但兩者並不是相斥，而是相容，互相支援的。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在當時為中東路事件而參戰的部份學生心理上，也是同時並存的。

但是，由鹽的故事、澡堂事件的發生及蘇聯當局處理這些事件的態度和方式；由中國學生在冬宮博物館看到中國珍品和蘇聯因中東鐵路而出兵，所引發的民族主義情緒；或由中國共產黨員轉成蘇聯共產黨員必須被降級等等，都可以看出落實國際主義理想所遭遇的阻力。蘇聯共產黨員在黨務方面表現的傲慢與優越感，與民間普遍存在的種族偏見與沙文主義，證明了要想在短時間內改變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或沙文主義心態是極為困難的。而這些阻力的發生也正好說明了具有烏托邦色彩的國際主義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葉劍英傳略》（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

史泰慈書中談到，十月革命後烏托邦夢想主要是從下而上的較多，¹⁰¹即民間熱衷的革命性社會試驗比官方提倡的多。國際主義則剛好相反，它基本上是從上而下的，即蘇聯當局推行國際主義要比民間自發性的實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隨著時間的推演，蘇聯推行的國際主義，也漸漸由光譜理想層面的一端，走向策略層面的另一端。到了 1930 年代後期，國際主義的理想層面幾乎已經蕩然無存。¹⁰²

國際主義的光譜既然同時包括純策略性運用的利己考慮到利他的理想主義色彩，蘇聯當局與中國學生便可游走其間。當中國學生拒絕接受所看到的現實時，會回到理想層面去要求。反過來說，蘇聯發現國際主義的理想窒礙難行時，也會從策略運用的角度，甚至權力的強迫下去要求中國學生妥協。例如，學生遭受歧視或不平等待遇而發出的不平之鳴與質疑時，他們可以用打架或聯名寫信給蘇共中央等方式，表達不滿，爭取國際主義理想的實現。而蘇聯的因應之道，則因涉及層面的不同而有差別。在日常生活和黨務方面，學生表達不滿，尚不致受罰。但是若升高到國際層面，如中東路事件，蘇聯當局要求學生的不只是妥協，而是絕對的服從，否則學生可能會遭到逮捕流放的命運。

基於以上論述，從光譜的角度分析國際主義，純粹利己和純粹利他兩種成份不但可以互相依存、互相轉化、互相滲透，也可以是互相對立、互相鬥爭的。忽略它們之間的複雜關係，對於了解民族主義或者國際主義都會陷入以偏蓋全或顧此失彼的泥沼之中。

101 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251.

102 自從史大林政權穩固之後，俄國革命以來的各種烏托邦理想與試驗相繼落幕。取代革命烏托邦主義的是史大林的「當權烏托邦」(utopia in power)，即偏重官僚國家的中央集權與對史大林神話般的個人崇拜。「嫌惡實驗」——厭惡 1920 年代盛行的各種烏托邦理想的社會試驗，是 1930 年代的新心態。不管是對內對外，歌頌蘇聯，歌頌史大林，成為官方施政的重點。從 1929 年底起，共產國際陸續將各國共產黨領袖換成完全聽命於蘇聯的人。各國共產黨沒有辯論或選擇的餘地，違抗的話，便成為共產主義的敵人，所以必須擁護蘇聯的一切政策。而自 1935 年之後，各國共產黨為支持抵抗德國與日本的侵略，完全支持共產國際提出的統一戰線。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8, 246; E. H. 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1930-1935*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pp. 5-6.

最後，本文並不否定民族主義或政治外交問題在中俄關係研究上的重要性，只是想藉著國際主義等其他文化因素的加入，來呈現中俄關係研究上更為複雜的面貌而已。